

月的意象,传达了一种悲秋和孤独的情感。诗人以“孤蓬月”象征着漂泊无定的孤客,通过“一笛风”表达了孤独中的一丝慰藉。诗人在“临渊独啸无人和,时有冯夷舞玉宫”中,通过“独啸”和“无人和”表达了一种孤独感,而“冯夷舞玉宫”则带有神话色彩,增添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和艺术魅力。

海洋神话意象丰富多彩,在海洋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这一方面源于古人对海洋的有限认知和丰富想象;另一方面,道教文化将海洋视为神仙居所,加深了其神秘感。因此,诗人笔下的海洋常带有神话色彩,与实际的海洋有所区别。《浮海》二律,其一“试将我意问冯夷,士子何辜苦祸之。不放禹门看鲤化,却教瀛海觅鲸骑。云梯莫步波心月,丹桂难攀影里枝。手把香醪无土滴,白头空有泪双垂。”通过提问冯夷的方式,表达了对于士子遭受不幸命运的同情与不平。这里的“冯夷”不仅是海洋的化身,而且是诗人情感的寄托。诗人用“禹门看鲤化”和“瀛海觅鲸骑”两个意象,分别代表了士子们原本应有的平步青云的愿景,和现实中不得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寻找生存之路的艰难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强化了诗人对于士子命运的悲悯之情。

《鸡肋集》中的海洋书写不仅以其生动的自然景观描写吸引读者,更融入了深邃的哲学思考和对自然规律的洞察,彰显了其卓越的文学造诣和哲学修养。在《海天长啸图》中,诗人通过对海洋景象的细腻刻画,体现了对自然之道的深刻领悟。诗中的“高秋碧海孤蓬月,晴日沧州一笛风”不仅描绘了一幅辽阔秋日海景,更通过“孤蓬

月”和“一笛风”的意象,传达了自然界中万物互联、生生不息、循环往复的哲学理念。在《海边纪行》中,王佐通过对临海百姓日常生活的观察,展现了其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力。诗句“潮痕每准星长短,水候仍催月次躔”不仅反映了潮汐现象的规律性,而且隐喻了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微妙联系。

社会本位:《鸡肋集》涉海创作中的现实主义

明代海南诗人的涉海、咏海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海南地方特点,以丘濬与王佐为例,二人交往较为密切,但对海洋的书写却各有侧重。丘濬官至明朝宰辅,其诗作眼光并不止乎伤春悲秋和自我感伤,更多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理学、医学等各个方面,其涉海诗中对海上贸易的书写值得关注,学界已有部分论述成果。相比而言,王佐更加贴近日常生活,对海滨生活的描写和感受更加细致入微,以当事人的第一视角出发书写闻见一手材料的真实感受,使得作品读来更加亲切可感。

王佐一生仕宦多地,晚年对家乡的民生民情愈加关注,其立足现实,诗笔细绘海南悠久历史;同时也字字泣血,展现天灾人祸下的民生多艰。通过他的笔触,能够洞察到明代海南社会的多重面貌,以及个体如何在社会本位的视野下,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文的桥梁。

王佐的《南溟奇甸歌》是一首以海洋为背景、对海南进行热情歌颂的长篇叙事诗,不仅展现了海南岛的自然美景,还深入探讨了其历史演变和文化成就。诗的开篇即以神圣的笔调赋予海南岛神奇的色彩,通过“褒封到”和“天语便代天地造”

等词句,将海南岛描绘为天赋之宝地。这一设定贯穿全诗,营造了对海南岛的崇敬之意与深切情感。在历史与文化层面,王佐回顾了海南岛的历史发展轨迹,通过对“隋唐一统”和“宋设科目网人才”等历史节点的提及,展现了岛上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演变。诗人对海南岛文化教育的赞扬,如“士有白袍倡文运而肇破天荒”,强调了教育在文化繁荣中的基石作用,体现了对海南岛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视。

王佐在《鸡肋集》中,以其深沉的社会意识和对民生艰难的敏锐体察,展现了他对时代苦难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。此类书写,如《苦大风雨》《海边谣》等。在《苦大风雨》中,作者通过“海国今秋风雨多,等閒平地欲成河”的描写,形象地描绘了秋天时节风雨频繁,原本平坦的土地转眼间变成河流的情景,反映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。诗中的“折腰半是遭风树,生耳惊看厌雨禾”进一步描绘了风雨对农作物的破坏,以及百姓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奈和辛酸。这种对灾难场景的直观描绘,不仅展现了作者对民生艰难的深刻理解,也表达了对受灾民众的深切同情。

纵观王佐涉海创作的诗文,相较于以大陆视角展开的海洋书写,王佐作为海南本土诗人对海的感受力可见一斑。海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,是其独特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共同塑造的结果。海南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,也保持了本土文化的连续性与独特性。王佐的《鸡肋集》正是这种文化融合与传承的生动体现。■

(作者单位: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

本文责编/蔡萌 邮箱/394666442@qq.com